



皇史宬正殿

□云韶

位于天安门东面的南池子，有一道高大醒目的朱红围墙，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金匱石室”所在地——皇史宬。

所谓“金匱石室”，简单来说，就是古代收藏重要文书的地方，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档案馆”。而皇史宬，就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国家“档案馆”。近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完成对皇史宬的修缮和展览布设，这座故官边上的“神秘小院”在封闭百年后已开放团体预约参观。

皇史宬专门收藏列朝的实录宝训。实录，是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皇帝死后，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以为修史的依据。宝训，是皇帝统治时期的言论谕旨，也是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便是清人依据明朝的实录和宝训修成的。

明朝各朝实录规模都很庞大。记忆中，大学图书馆有这套书的影印本，虽然经过了技术处理，仍占据了大半个书架。上学的时候，有幸曾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明神宗实录》中的几卷，其措辞之谨慎，记事之详细，至今记忆犹新。

能让史臣付出这么多努力修撰，足以表明，实录和宝训在各朝享受的就是“正史”的地位。正因为此，它们需要重点保护。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实录和宝训并没有和其他资料分开。太祖的时候，它们被藏在了南京的大本堂、文渊阁，后来成祖迁都北京，文渊阁成为了大学士议政之所，实录和宝训被放到阁东的五间房屋贮藏。一直到孝宗弘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明廷有了兴建皇史宬的动议。

弘治时期，此前各朝的实录和宝训数量已颇为可观。比如说，《太祖实录》就有二百五十册，《宝训》十五册；《英宗实录》则有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这些实录和宝训都收藏在内阁，而且只有一部，别无他本，一旦遇到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史料，大学士丘濬在弘治五年，建议为累朝的实录和宝训设立专藏，并就建筑地点、材料、贮藏工具等提出了较为详尽的设想。他上书道：“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匱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錡金以为匱，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存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

丘濬认为，自古以来国家重要的档案都放在金匱石室里，相对于土木材料而言，金石更加坚固，可防潮防火，长久保存档案。他向弘治帝建议，为稳妥保存国家重要文献档案，应该在紫禁城内建造一座砖石材料的建筑，把档案放入金质的柜子里，再把柜子放到该建筑内。同时，他还建议该建筑的选址地点为文渊阁附近。

让人遗憾的是，孝宗对于丘濬的想法虽然表示了赞许，但是只是部分采纳。至于为何没有全部被采纳，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世宗朝，丘濬的想法才得以实现。

世宗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皇家官殿多次遭受火灾。根据《明史》记载，从弘治到嘉靖年间，火灾屡屡发生。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官后三小官发生火灾；嘉靖四年三月壬午夜晚，仁寿官发生火灾，玉德、安喜、景福等官殿被焚毁；嘉靖八年十月，大内所房发生火灾；嘉靖十年正月，大内东偏发

生火灾；嘉靖十年四月，兵工二部公廨发生火灾，且烧掉了大量文籍。

火灾频发，引发了世宗的警惕。为了防止训录被毁，继位不久，便诏谕内阁，称祖宗的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匱藏之。建造神御阁于南内重华殿西。世宗亲临定制如南京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筑。阁上奉御容，阁下藏训录。因为石匱夏季容易潮湿，故改制铜匣。议定之后，于嘉靖十三年七月，开始了建造工作。

建造过程中，世宗改神御阁为皇史宬。历经两年整，皇史宬于嘉靖十五年七月竣工。

皇史宬的規制，宏大敞亮，龙阁崔巍，四周上下纯用石甃，不假寸木；主殿坐北朝南，通体基本上可以称为石屋。其台基、墙壁均由砖石砌成，门窗、梁坊和斗拱等传统上应该用木料的地方用的也是仿木石料。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功能齐全，华贵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又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

新修好的皇史宬，除了收藏累朝训录之外，还藏有《永乐大典》副本。嘉靖三十六年，宫内失火，藏有《永乐大典》的文楼文渊阁遭到了焚毁。经明世宗督促，总算幸免于难。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命将孤本《永乐大典》摹写一副本，于隆庆元年誊录完毕。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以《大典》之重要，也足见皇史宬之受重视的程度。

皇史宬毁于明末的战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山海关之战失利，出离北京时，发炮放火，焚烧了皇宫。火灾过后，只有太庙和武英殿尚存，皇史宬在这场浩劫中也没有幸免。像《明熹宗实录》，便毁于此难。这对晚明历史的研究，是个重要的打击。

清朝入关之后，皇史宬大体上按明制复建，只是将门额的字做了改变，改成了左汉右满两种文字合璧。清代除了在皇史宬保存实录、圣训和玉牒之外，还另贮《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以及107颗将军印信，两侧配殿还保存过内阁题本的副本。

另外，主殿内石台的布局有所调整。第一次是将明代的20座小石台改建成了前后两座较大的石台。到了嘉庆年间，又将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大石台，这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石台。这样改建完后，石台上就能够容纳更多的金匱了。

有意思的是，咸丰去世后，在摆放他的实录和圣训时，却发现石台就剩下两个空闲的金匱了，如果不对现有档案进行归并，咸丰帝的二十个金匱档案没有地方摆放，于是同治皇帝将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实录金匱进行了归并，这才最终将咸丰帝的实录圣训放进去。同样在摆放同治帝的档案时，光绪皇帝再次对已有金匱进行了归并。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皇史宬最初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1925年溥仪出官，皇史宬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把皇史宬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5年成立国家档案局，皇史宬移交档案局管理；自1956年起，国家陆续拨巨款对皇史宬进行了多次修缮；1982年，皇史宬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皇史宬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对其保护一直比较滞后。堂堂国家级别的档案馆的南院，竟然成为了居民的大杂院。幸好，当地政府没有任由这个问题继续发展，借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东风，北京对皇史宬的违建进行了整治。此后，又经故宫博物院进行专业修复，还原了古建风貌。

【大观园】

土豆玉米的跨国之旅

□张宇鸿

在咱们的餐桌上，一直离不开玉米和土豆，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最能代表传统农业文化的玉米和土豆竟然是远渡重洋的“舶来品”，在山东大地仅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有趣的历史呢？

公元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经过万里航行，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现新大陆——“亚美利加洲”。这片沃土幅员辽阔，作物丰富，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大开眼界。之后的数百年，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中美、南美洲开展广泛的殖民活动，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方向，并对万里之外的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受登陆地点的影响，欧洲人最先对中、南美洲进行了探索，这里生活着大量黄皮肤、黑头发的印第安人，他们分属于玛雅、印加、阿兹特克等部落帝国。令欧洲人吃惊的是，大部分印第安人的生产力仍停留在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制品和大型牲畜，但他们却建立起了一个个庞大而独立的帝国，养育着数千万人口。在长期观察中，欧洲人终于发现其中的奥秘：原来，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生长着许多独一无二农作物，淀粉含量高，易于生长，无需过多打理就能为当地人提供大量热量，玉米和土豆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时期，亚洲、欧洲都面临着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同古代中国人一样，欧洲先民很少食用植物块茎，主要还是将小麦、大米作为主食，因此最早由美洲探险家带回的马铃薯并没有被欧洲人重视，只留意到了它紫色的小花，被贵族们作为装饰盆景。后来一位法国农学家安·奥巴曼奇在长期观察和亲身实践中，发现马铃薯不仅能吃，还可以做面包等。从此，法国农民便开始大面积种植马铃薯。1565年，马铃薯传到爱尔兰。不久，其作为主食逐步扩散到印度、爪哇等地，最终传入中国与日本。

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撰著的《长安客话》卷二《黄都杂记》中，记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明代上林苑有专司蔬菜种植的“菜户”，在筛选、培育马铃薯上有一定技术优势，但作为服务于宫廷的机构，既不会大面积栽种马铃薯，更不可能将薯种和种植技艺传入民间。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土豆重蹈了在欧洲的“冷遇”。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古怪”作物，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大厨，也不知该如何烹饪。可能因为马铃薯外表与传统作物芋头很相似，又同样出自地下，人们便将其视作芋类的一种，并仿效烹调芋头的方式对其或蒸或煮。马铃薯最初曾是官中宴飨的高级食材，但御厨们对于烹饪这种高淀粉植物没有经验，没有创造出独特的烹调手段，而民间也对烹饪马铃薯兴致缺乏，在整个明代，人们关于马铃薯没有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只是模糊地将它当作一种新型的芋类浅尝辄止。

清朝入关后，随着社会环境稳定，我国人口出现了大规模激增。顺治十八年(1661年)，

清朝官方统计的人口仅有1920万，雍正时期人口开始激增，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人口达到1.43亿；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人口达到了2.96亿；而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达到了4.12亿。巨大的人口压力迫使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有规模地种植土豆等新型作物。清代对马铃薯最初的做法是打磨成粉，与荞、麦等主食一同烹煮。这种做法虽依旧有些寡淡，但比之单纯地蒸或煮还是有一丝新意的，更重要的是，它能贮藏。因此，较长时间内，马铃薯粉在全国多地颇为盛行。而在偏远山区，由于环境恶劣、粮食缺乏，马铃薯渐渐晋升为主食，其做法也开始丰富起来。随后的一百年，土豆在中国彻底生根发芽，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战争、蝗灾、洪水等动乱中，小小的马铃薯用一点点甜糯的淀粉撑起中华文化的根脉，成为田间地头最常见的面孔。

与土豆略显不同的玉米，则有着更为坎坷的身世。现代生物技术和考古资料都表明，玉米这种作物不仅仅是自然创造的，也是南美洲土著千年之间不断培育的结果。野生玉米只是一种生长在南美洲山地的野草类植物，是当地原住民不断杂交培育才有了现在我们熟悉的玉米棒子，在玛雅和阿兹特克文化中都有着对玉米神的图腾崇拜。

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传入欧洲55年后，河南《襄城县志》出现了关于玉米在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经过河南巩县，又被《巩县志》留下记载。湖北“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穷民赖以生”。

到了清朝嘉庆皇帝时期(1796-1820年)，湖南湘西的《龙山县志》记载说，当地的棚民“烧舍种植杂粮，包谷尤为大庄”，同时期的湖南浏阳，其《浏阳县志》也记载说：“山土只种包粟”。

玉米传入中国后，老百姓们对于这种香甜的美食赞不绝口，大家起初将玉米带皮直接烤熟食用，后来将软糯品种的玉米蒸熟，别有一番香甜滋味。中国北方的百姓更是将玉米晒干磨成粉煮粥，一碗热乎乎的棒子面粥是许多游子对于家乡最难割舍的回忆。

时光荏苒，原本神秘的土豆、玉米在中国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美食。西班牙人掠夺的黄金白银早已湮没在宫廷的纵情声色与比斯开湾的炮火中，但美洲人真正的瑰宝——玉米、土豆等作物，却在沉默中征服了世界，直到现在，仍向我们展现来自新大陆的智慧与骄傲。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短史记】

明清皇史宬，保护皇家档案有『双保险』